■历史·民族研究

宋代理学兴起对中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启示

林　亮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福州　350202）

摘　要：宋初儒学与当前我国传统文化所处的历史境遇具有相似性，都面临外来文化的严峻挑战，并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宋代理学在重塑文化认同、重构话语理论体系、重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等方面获得了成功，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支柱文化。在当代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中，我国传统文化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在指导实践，或是在文化认同方面，面临着重大的困难，而宋代理学的成功经验实有益于我国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宋代理学；传承；传统文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G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12－0091－03

PDF **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7.12.020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s Inheritance of Great Traditional Culture

LIN Liang

(*Fuzho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3502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is similar to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s faced with the severe challenge of foreign culture conflicts and has been marginalized.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was successful in reshap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reconstructing the centralized power theory system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It made Confucianism become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ss in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ur country are facing great difficulti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guidance, lack of cultural identity. But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Neo 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is beneficial to 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heritage; Traditional culture; enlightenment

宋志明认为：宋代到清末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儒、释、道三大思潮尽管在事实上仍旧延续着，但不再构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在学理方面，释道两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没有取得新进展；唯有儒家保持着发展的活力。宋代以后，儒者充分利用三教的思想资源，实现综合创新，创立了儒学的新形态——宋明理学。”[1]86 宋明理学成功的使儒家获得了新生，这其中必然存在会有给我们当代中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予以启示的宝贵经验。而宋代又是理学起步发展期，本文试图探讨宋代理学兴起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启示。

一、唐末宋初儒学面临的困境

唐末宋初的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社会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儒家的伦理规范失去的作用，使其权威不及往日。自汉武帝以来的“独尊儒术”变为儒释道三

收稿日期：2017－05－24；**修回日期**：2017－06－09

基金项目：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校级课题(FWX15034)

作者简介：林亮，男，福建龙岩人，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哲学。

家并称，实是儒家日渐式微的体现。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唐朝，道教一度被立为国教，佛教也获得了统治者的重视。佛道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显，也引起了儒家士子的忧虑和危机感，形成了要重振儒学纲纪的历史使命感，使社会重归文武周公之道。“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开始混同。在这种情况下，从世俗生活中去除宗教迷狂的浸染，也就形成了一种切近的需要，特别是对于一个以治理国家为核心关注的士大夫而言，这种需要自然会更加强烈。”[2]209 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韩愈那个时代，当时儒学衰败的程度，已经到了寻找不到身份认同的根据。

二、宋代理学获得成功原因

在唐时，部分有识之士反应甚为激烈，例如韩愈其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李翱在《复性书》中有云：“百姓者岂其无性者邪，百姓之性于圣人之性弗差也”，作为百姓的个人，与圣人是一样具有天地之“性”，通过个人修养，以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虽然，如韩愈和李翱等学者在辟佛老的方式方法有商榷之处，但所表现出来的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恢复社会伦理秩序的态度却值得肯定。正是因有这些有识之士的呐喊，才为后世儒学开启新的自我重建阶段。

到宋初，随着社会相对稳定和经济繁荣，宋朝重视文官的制度相对于唐朝来说也有诸多变革。学术氛围比较宽松，文人不会因为错言被杀头，根据《宋史》卷157《选举志》写道：“仁宗时，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客观上促进了“宋学群体——有自觉意识的儒学群体”的形成，是理学兴起的文化基础。

在宋仁宗时期，兴起了各学派的理论，主要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道学（即程朱理学，此处是狭义上的理学）。这些学派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主张排佛拒老，崇尚儒学。但在学理内容上各有其一套理论。最终，理学异军突起，并传承发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理学所受的政治非难相对其他学派更多更严重，在北宋末期到南宋前期以及朱熹晚年时期，例如伊川先生曾被人指控“非毁朝政”（伊川先生年谱），朱熹晚年因政治斗争，其学术被污为“伪学”，遭到查禁。在宋初的儒家学派中，有一个共同点：倡儒学。那么，为什么只有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能够兴起并发展呢？这是值得思考的。杨立华先生在《论宋学禁欲取向的根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结果》一文中有作如下分析：“这些思想（笔者注：指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要素本身便无法构成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同时，有没有其核心的关注点，在当时新儒学理论初见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论架构，显然是不合时宜的。”[3]53 而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也存在诸多矛盾。例如，苏氏父子排佛老，但又认为佛老“无害于世”，在个人生活态度上更是沉迷于佛老。而其理论不完备体现在“不能以一种根本性的伦理精神形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就不能建立起一种从根本上区别于佛老的儒家独有的生活方式。”[3]54

程朱理学在辟佛老过程，重建儒学的理论架构和话语体系，“宋明理学家讲儒学的话语，已由政治哲学转向人生哲学。”[1]87 理学家使经学时代的儒学的权威主义转变到注重义理的理性主义。正因为这种理论体系的转换，理学把玄学的“体用关系”发展为“理事关系”，使之成为理学的核心话题。“理事关系”的提法，并不否定“体用关系”，“理”对应着“体”，“事”对应着“用”，用一种更加贴近人们伦理生活的话语表达。“理事关系”也有对佛教理论的借鉴，同时，对于佛教否定此岸世界的真实性的观点予以摒弃。通过周、程、朱等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以儒家理论为根本，融合了释、道的合理理论，开创了自宋以来中国哲学的高峰。简而言之，理学之成功，第一，力辟佛老，力倡道统，力求儒家身份认同；第二，重构理论体系，建立形而上的“理”，为人们的修养生活方式提供形而上的根据；第三，重建话语体系，建立更愿意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有序伦理生活。

三、宋代理学的成功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启示

“当中国的新文化随着商品的输出和国家强大而为人们所认同时，文化复兴才随着民族的复兴而真正实现”[4]24。当前，我国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当代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自身理论创新的困境和外来文化挑

战,主要是:第一,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农耕经济社会转变为工业经济社会,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真正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第二,西方强势文化席卷神州大地,从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到形而下的生活实践,无不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文化环境,或缓或急,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第三,中华文化的理论与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脱节。中华文化倡导的礼仪道德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社会生活现实面前,显得迂腐过时,致使传统的文化理论无法在广大民间获得广泛认同。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与困境,我们认为从宋代理学兴起的历史经验中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一)适合社会发展趋势,获得大众文化认同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要生存和发展,都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历史已经清楚的表明,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将被历史淘汰。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和儒家,在当世都是显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墨家逐渐被历史边缘化,而儒家也曾经历秦代的"焚书坑儒",汉初又以黄老之学为治国之学,并没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文化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思想文化,表明儒家思想是汉武帝所处的历史时代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汉武帝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也经历挫折,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但能自我革新,返本开新,使儒学经过改造后再次适应当时是社会发展需要。例如宋初理学兴起。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是全盘继承,而是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获得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性存在,获得本民族人民的文化认同。

(二)重构话语理论体系,建立形而上根据

宋初儒者在力辟佛老的过程中,采取"修其本以胜之"的方法,成功的使儒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就如涅槃重生一般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形成了儒学理论的新的形式——理学,在这里,儒学事实上是重构了话语理论体系,使儒学获得了形而上的理论支持,具备了反击佛老的理论基础,成功的使转型后的儒学——理学击败了佛老二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的现实社会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要获得新生,根据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变革自身的理论内容,坚守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吸收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内容,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经济社会的语境中获得发展建立形而上的根据。当建立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理论体系,传统文化就重建了新的话语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不仅是能够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具备能够不断自我变革的基因以及支撑这种变革的根据。

(三)扎根社会生活实践,使传统文化返本开新

理论的超越性要求反映了理论的普遍性适用性特征,而仅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求该理论要能够融入当下的社会生活,在经验世界里,该理论要能够回答和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近代儒学的衰落,正是因为随着西方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携工业革命的威力横扫中华大地,让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毫无招架之力,世界上非西方的其他文化也具有类似结局,有些非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直接消失在历史中。中华文化一度要被自己的民族扫地出门,放在历史博物馆供人凭吊。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表现出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矛盾冲突,甚至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绊脚石。这种现象,儒家思想在历史上似乎不是第一次碰到,但这次来得似乎更猛烈。反思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失范与失势的原因,显得比历史上曾经遇到过的类似情况更为迫切。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无法回答解决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强势的军事、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入侵时碰到的问题。以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时代背景,重构中华文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华文化的理论能够回答和解决人们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重塑中华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而以上几点,我认为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在指导实践方面,或是在文化认同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但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中华文化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中华文化的理论体系重构获得了实质的进展;中华文化理论有效的解决生活伦理生活中出现的困难。

[参考文献]

[1] 宋志明.论宋明理学的成因和变迁[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11):86-91.

[2] 杨立华.气本于神化——张载哲学论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杨立华.论宋学禁欲取向的根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结果——从韩、李异同说起[J].中国哲学史,2002(2):44-45.

[4] 王福革,卢少志,包塔娜.新时期中华文化复兴之文化要素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5):23-26.

[责任编辑　李兆平]